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专家学者

访谈录

海帆 采编

中国藏学出版社



K281.4-53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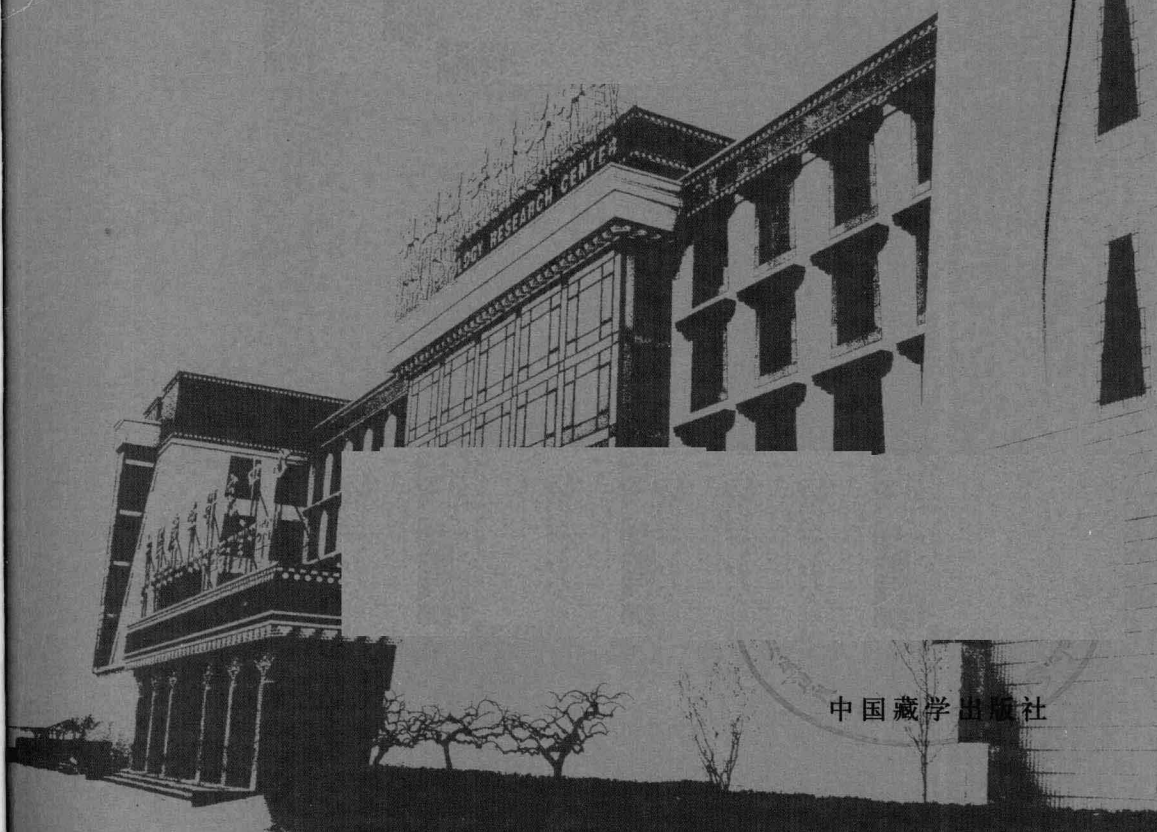
K281.4-53
23

ZHONG GUO ZANG XUE YAN JIU ZHONG XIN
ZHUAN JIA XUE ZHE FANG TAN LU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专家学者

访谈录

海帆 采编



中国藏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专家学者访谈录/海帆采编.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 - 7 - 80057 - 963 - 9

I. 中... II. 海... III. 藏学 - 中国 - 文集 IV. K281.4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7842 号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专家学者访谈录

采 编 海 帆

出版发行 中国藏学出版社

印 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3

字 数 317 千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80057 - 963 - 9/K · 1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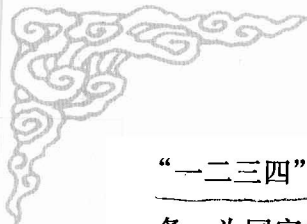
定 价: 38.00 元

序 言

陈 虹

当代中国藏学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于1986年5月20日在北京成立。它是全国唯一以单一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国家研究机构。由于西方极端政治势力的干预，由于东西方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当代藏学已被蒙上浓厚的政治色彩，国外出版物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歪曲、捏造历史，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西藏政策，为煽动“西藏独立”提供理论依据的。因此之故，我们的藏学研究，不得不寓政治于学术中。中国藏学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它以丰富的学术成果和客观的事实依据，向世界展示西藏的真实面貌。揭穿国际舆论上的某些政治谎言，是中国藏学家的历史使命。

时至新世纪的2000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更上一层楼，提出“一二三四”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以及“三步走”发展策略。我们的



“一二三四”是：明确一个中心，以科研业务工作为中心；搞好两个服务，为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服务，为西藏和其他藏区的三个文明建设服务；建设三个一流，培养一流的专业队伍，出一流的研究成果，创一流的科研机构；实施四大战略，名家战略，精品战略，国家队战略，开放战略。我们的“三步走”是：第一步，理顺关系，打好基础，把藏研中心建成国内一流的藏学研究机构；第二步，着重构建组织协调全国藏学的机制，打造凝聚全国藏学专家学者的平台，提高全国藏学研究的整体水平；第三步，建立国际藏学统一战线，在主要学科达到国际学术领先地位。

我本人有幸于新世纪来临之际，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工作。藏学对我来讲，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我是学林业的，先是在林业部工作了23年，然后在民政部工作了7年，又在国家民委工作了7年。我过去没有研究过藏学，也不懂藏语，没有西藏工作经验。但我在这里工作很愉快，其原因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上有中央统战部领导的信任，下有中心全体同志的支持，特别是有领导班子之间的真诚团结、密切合作，这三条是藏研中心发展的根本。

我的搭档拉巴平措总干事曾任西藏自治区副主席，有丰富的领导工作经历和经验，又是学者型的领导干部，是博士生导师。他是我国第一批藏族大学生，出生于农奴家庭。副总干事格勒博士也是农奴出身，他的学问很好，是国家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他的成长经历也很特别，以前家里很穷，后来拼命学习。我们请他在中心作成长报告，这不仅为年轻学者树立了榜样，而且感动了各族干部、群众。他精通汉、藏、英三种语言，在国内影响很大，国际声誉很高。他分管科研工作，情况熟悉、思路清晰，有很多新点子。历史所原所长陈庆英功底深厚，做学问扎实，也是博士生导师。我们还有两位特殊的藏学家，一位是叶星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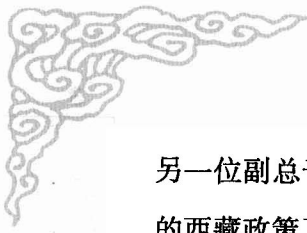
他是藏学界的奇才，数十年如一日收藏藏族艺术品，又舍得捐赠国家；另一位是马丽华，是作家，出版了多部以西藏为题材的文学作品。

我们还有一些已经成名的中年学者。比如张明，他的研究贴近现实，长期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为党和国家制定政策、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问题写了许多好文章。比如西藏农牧民穿鞋问题，事情虽小，但想的是群众，解决得好，影响大。他提出操作性很强的建议，得到西藏自治区政府的高度重视。后来他又关注起保护发展西藏手工艺品的问题，同时对西藏基层政权的加强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们的才让太博士从事苯教研究，精通藏、英、汉、意四种语言，并能够以这四种语言撰写学术论文。他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在这个领域里他是国内第一位系统研究的学者。正在学梵文的李学竹，是在日本读的博士，我们很需要这方面的人才。我们的周炜是语言学博士，在藏区生活时间长，精通藏文，长期对边境贫困县进行调查。他认为边民是不穿军衣的哨兵，改善边民的生活就是巩固了边防。我们的郑堆是年轻的藏族学者，现任宗教所所长，近年来重点研究藏传佛教如何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课题，研究高级僧人的学衔制度，取得了可喜成果。

我们历史所的周源、张云、熊文彬都是优秀的学者。周源研究清代藏族史，张云研究元明藏族史，熊文彬研究佛教艺术，这三个人都各有特点。历史所还有一个冯智，他是藏族学者，刻苦钻研，也很年轻。经济所还有一个旦增伦珠，他是一个很有思想的同志，考虑问题比较深。旦增伦珠对基层政权机构，如“雪”居委会，有特别的研究，而且注意怎样将藏族利益与国家利益结合起来。

我们的副总干事大丹增，是自学成才的学者，研究西藏民俗，他负责《大藏经》对勘工作，分管我们的中国藏学杂志社和北京藏医院。



另一位副总干事毕华，南开大学毕业，一直研究西藏问题，对党和国家的西藏政策了如指掌，在国际圆桌会议上，在世界人权大会上，为维护我国的主权据理力争，贡献很大；她还主持起草过一些研究西藏问题的权威性政策文件；她对西方社会的，比如美国的西藏政策也很熟悉。

藏研中心的人才是多方面的。比如中国藏学出版社社长索朗多吉同志，是藏语文专家，又精熟汉语；图书资料馆的阿华有很多学术成果；扎西次仁同志在藏文软件方面有很好的研究成果。在行政管理方面，办公室、科研办、机关党委的柳应华、杨坚赞、高玉虎等同志互相配合，想方设法为科研工作服务，为干部群众提供生活保障。

以上我仅仅举了几个例子，难免以偏概全。而对提及的每个人，又只是讲了几句不痛不痒的话，很难勾画出他们的特点，只是有感而发而已。若是要写藏研中心群贤谱，必须组织力量下一番真功夫。至于今后的工作，我的想法是：一是注意坚持我们的政治属性，我们既是一个学术机构，又是一个政治敏感性很强的单位，是中央单位，也是民族单位，属统战部管，有一点闪失就影响很大，一定要把握好政治方向；二是抓住人才战略不放，从全局讲是为国育才，从培养干部来讲，是让年轻同志很快成长起来，他们都是好同志，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发展前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攻方向，每个人都要有所创新，争取达到更高水平；三是领导成员必须加强服务意识，给科研人员创造一个互相信任、互相帮助的和谐环境，尽力为他们提供可靠的工作条件和生活保障。

值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成立 20 周年之际，我们以访谈录的形式出版这本书，向外界介绍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一部分藏学家。本书从多层次反映当代中国藏学的各个侧面，使读者产生轻松阅读感。这些藏学家的访谈，具有鲜明的个人色彩，他们对各自学术领域深入浅出的介绍，对

各自学术生涯的感受，对中国藏学的独特见解，均生动有趣。我们感谢诸位藏学家于百忙中接受采访，也感谢海帆女士有兴趣整理这些采访笔记，出版这样一本书。





朱晓明 汉族,1949年7月生,江苏南通人。197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同年进藏,在藏工作13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总干事。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当代西藏问题专家,中央民族大学兼职教授。1986年为中央党校西藏班开设“西藏社会主义建设”专题讲座。1988年撰写《搞分裂不得人心》等多篇评论。1992年至1993年,配合国际人权斗争撰写《拨开迷雾》、《西藏人权问题纵横谈》等文章。1997年为国防大学外训系外军学员开设“西藏的历史与现实”讲座。2003年出版《新时期民族宗教工作的实践与思考》论文集。2005年发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观”》等论文。

目 录

序 言 / 陈虹	1
在实践中思索的当代西藏问题专家——朱晓明	1
世界最大藏学研究机构的领军人——拉巴平措	21
从草原走向世界的人类学家——格勒	39
西藏是她魂牵梦萦的地方——毕华	67
悉心研究藏语的汉族教授——胡坦	87
于颠沛转徙中严谨治学——邓锐龄	105
半路出家的儒雅学者——陈庆英	123
由文学而学术的语言学博士后——周炜	143
跟国际对接的年轻博士——旦增伦珠	161
将系统工程理论应用于藏学中——张明	179
温厚学者的执著追求——熊文彬	195
探究藏传佛教文化的年轻所长——郑堆	213
默默穿行于苯教及象雄之间——才让太	241
坚持理性思考的历史学博士——廉湘民	265
把书当饭吃 视学问为宗教——杜永彬	283
行吟西藏的心路历程——马丽华	307
天生与藏学有不解之缘——安才旦	321
走火入魔的“高原怪杰”——叶星生	339

在实践中思索的当代西藏问题专家

——朱晓明

人生的轨迹往往始料不及，因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因着个人的气度志向，其间有种种曲折、机缘、智慧，乃至执著，最终却是出乎意料的偏移或回归。而这种偏移或回归，往往于社会是呈现其巨大的支配力量，于个人则是显露出丰富的才智和潜能。而且，人生舞台越大，这种始料不及的变化就越多。

以当代西藏问题专家为人所知的朱晓明先生，1976年由北京大学毕业后奔赴西藏时，不会想到再过13年又回到北京；2003年由统战部民族宗教局局长、副秘书长升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常务副院长，就此告别他曾倾注大半生心血的西藏工作和民族宗教工作时，不会想到才过了两年时间，又来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任党组书记，继续其“未了”的西藏情结。

或许是认为个人因素微不足道，或许是出于学者型官员的审慎风格，问到他的个人情况，朱书记总是三言两语，轻描淡写，远不及讲起西藏人权问题、邓小平民族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观热情细致。他说他在陕西插过队。他说他的爱好就是工作。追问他如何工作，突然说出一句很形象的话：“以前的同事形容我像一辆开足了马力的摩托车，只管突突突的往前开。”这使我突然有了一个主意，采访他以前的同事。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一位普通教员接受了我的电话采访。当时这位教员正要办一件急事，没有过多的时间给我，故其匆忙中的叙述是脱口而出

的，没有半点的犹豫和思考。

“他做事虽然雷厉风行，但并不会让人有压迫感，即使赶时间也能做到有条不紊。工作中不会说要你这样要你那样，而是以商量的口气委婉劝导你。他更多的时候是用自己的言行来做榜样。他会给你机会，尽量给你压担子。很多人都说，跟他干活特别忙。

“我们在同一个职工食堂里吃饭，一般是领导一个桌，教工一个桌，但有他在那一桌就没什么领导、教工之别，很多教工自然而然端了碗走到他那儿去跟他说话。所以有人说，他这个领导的门槛比较低。

“他做事情的一大特点是首先做调研，尽可能多方面去了解才开始做，而且做的过程中非常仔细。他的讲课稿子都是自己写的。看到好书就向我们推荐，也经常问我们有没有读到什么新书。像亨廷顿的那几本书《文明的冲突》、《我是谁？》等等，他很早就看过了。有时他也提醒我们思考一些问题，如宗教与政治、宗教与道德的关系等等。

“他的办公室东西虽然很多，但很整齐，要找什么都知道在哪里。我们学校一些四五十岁的中年教师都很佩服朱院长，都说能够跟他讨论学术问题，认为他特别有学术鉴赏力。他一旦看到一些不良的现象，就会想方设法去促成改进，比如向上级反映或提出一些建议什么的，很有正义感、责任感……”

两个13年

朱书记您好。2003年，您由统战部民族宗教局调往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任职时出了一本书《新时期民族宗教工作的实践与思考》，那是在此之前的十几年中，您所写下的有关西藏、民族、宗教工作方面的论文结集。给读者的印象是，您是在惜别以前的工作岗位，仿佛与西藏的缘分将就此结束。而您在提及以往的工作和生活时，用了一个您不习惯使用的句子：激情燃烧的岁月。

朱晓明：那是20世纪70年代，我和我的同班同学、新婚的妻子，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与首都高校的50多名同学一起告别京城，告别父母，带着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豪情和理想，踏上了西去的列车。在西去列车的窗口，看到了九曲黄河的上游。我们在甘肃柳园换乘汽车，然后沿青藏线，过沱沱河，翻越海拔5231米的唐古拉山口，经那曲、当雄，到达拉萨。从此和西藏结下了不解之缘，到2003年离开统战部的工作岗位，前后有26年之久。

所以您对西藏及西藏工作依依不舍。

朱晓明：这26年，分为前后两个13年。第一个13年是进藏工作。我们一家与西藏有三代人的联系，我的岳父母是当年进军西藏的18军老战士，我们两口子在西藏先后工作了十多年，我们的女儿也在西藏上过学，而且取了一个藏族名字。

您是从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一名普通干事做起，后来做到副部长。

朱晓明：在西藏我一直在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工作。在西藏工作，有一个好处，这就是很多事，不管你干没干过、会不会干，都要去干。因此，得到了不少锻炼的机会，也与许多藏汉干部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西藏的这段工作经历，使我对民族、宗教问题的重要性、复杂性，有了深切的感受。

那么您的第二个13年呢？

朱晓明：第二个13年是在中央统战部从事西藏工作和民族、宗教工作。

也就是1989年，您被调入中央统战部，前任《中国西藏》杂志主编，后任

民族宗教局副局长、局长,统战部副秘书长这段时间?

朱晓明:是的。我调入中央统战部后,先后20次进藏,并多次到新疆和其他民族地区从事调研工作。参与处理过民族、宗教方面的一些复杂问题和突发事件,参与筹备了民族、宗教、西藏工作方面的有关会议,组织起草有关文稿。在中央统战部工作的13年,使自己在从大局上观察和处理民族、宗教问题得到了教育和锻炼,同时也有一些难忘的人生经历。在西藏工作中,我亲身经历了从结束“文革”到改革开放的转变;经历了开放后出现一些问题,直至发生动乱、骚乱,参与了平息骚乱的斗争;经历了西藏从加快发展走向跨越式发展、从基本稳定走向长治久安的进程。既有过切肤之痛,又有过成功之快,其中的甘苦滋味绝不是读几本书就能领悟的,体会非常深刻。

说到您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研究时,您的同事提及您在西藏曾经翻过车,摔断若干根肋骨。

朱晓明: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到统战部以后去西藏次数最多。2001年5月23日,是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①签订50周年。以胡锦涛同志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进藏参加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庆祝活动。我作为代

^① 《十七条协议》:全称为《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于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签订。本协议的签订,宣告了西藏的和平解放。1951年4月,西藏地方政府委派阿沛·阿旺晋美等五人为全权代表,赴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谈判和平解放事宜。中央人民政府指派李维汉为首席代表,与西藏地方代表谈判。谈判进展顺利,遂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本协议。协议签订后,中央政府任命张经武为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

协议共有十七条,主要内容是:(一)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二)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三)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四)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五)实现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主要是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两方面的团结。(六)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七)依据西藏实际情况,逐步发展农牧工商业和文化教育,改善人民生活。(八)成立西藏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西藏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表团副秘书长、阿里分团团长，这是我到中央统战部后第十八次进藏，这次走得最远。

当时我与对口支援阿里地区的河北、陕西的领导同志，组成中央代表团阿里分团，河北是省委常委、秘书长张群生，陕西是副省长张伟。一同前往阿里地区的还有中国歌舞团演员组成的中央艺术团小分队，我们去那儿进行慰问和考察。

那是西藏的一个边远地区。

朱晓明：我们到达海拔约4600米的改则县时，已经是深夜1点钟了。那座仅有一千多居民的小县城，全城的干部群众竟然还在那里迎候我们，使我们深受感动。从拉萨到阿里，走了3天，每天行车都在20小时左右。在阿里，我曾前往公安、武警扎西岗边防大队和阿里军分区扎西岗边防连慰问干警、官兵，赠送收音机，并到达中印边界我方控制线哨所执勤点看望战士。

您对阿里地区有何感受？

朱晓明：感受很深。一是路况太差，比想象的还要差，路上看到数十辆卡车窝在一起无法动弹；二是车流量太小，反映出经济上物流量、人流量不大；三是车辆损坏率太高，由于路途长、路况差，我们的每辆车都发生过爆胎、更换避震器等大小故障，艺术团乘坐的一辆车由于更换轮胎时风太大，螺丝紧固不到位，行驶时发生左后轮胎螺丝绷断、轮胎飞出的险情，幸好无人员受伤；四是司机太好，其中大多数是藏族司机，有丰富的高原行车经验，吃苦耐劳，一车有事，众人相助，克服了种种困难。

慰问考察中，我们阿里分团按照总团领导的要求，充分肯定阿里地区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和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来发生的翻天覆地的

巨大变化，同时也深感阿里地区战略地位重要，但基础设施还很不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提出了解决阿里能源、交通、蔬菜问题的建议。提出在开发中特别要注意生态保护。

至于翻车，那是2002年在中央党校学习时去西藏进行社会实践，在林芝回拉萨的路上，由于雨天路滑，车打了滚，付出了伤筋动骨的代价。不过，那次调研还比较深入，在病床上完成了《巩固和发展藏传佛教寺庙爱国主义教育成果》的调研报告，并获得中央党校社会实践成果一等奖。

西藏人权问题

您是当代西藏问题专家、中央民族大学兼职教授，学界认为，您对所谓的西藏人权问题有深入、独到的剖析和见解。

朱晓明：我们首先要了解西藏人权问题的由来。也就是，所谓的西藏人权问题是在什么时候、什么背景下，由什么人提出来的。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统治集团发动了旨在分裂祖国的全面武装叛乱，人民解放军在百万农奴的拥护、支持下，迅速平息了叛乱。平息叛乱和民主改革的胜利，标志着政教合一、僧侣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度的终结，标志着西藏人民从此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叛乱失败后，达赖集团裹胁数万群众逃亡印度，在印度北部喜马偕尔邦的山区小镇达兰萨拉建立了所谓“流亡政府”，开始了其流亡国外，鼓吹“西藏独立”，从事分裂活动的生涯。

西藏的平叛、改革是中国的内政。但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却利用这一事件，在国际上掀起了一股反华浪潮。他们一方面在政治、军事、财力上给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以实质性的支持；另一方面，打着尊重人权的旗号，诬蔑和诽谤中国政府“侵犯西藏人权”。

1959年7月，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抛出了一份所谓“西藏问题”的调查报告，称无论在事实上还是法律上，西藏完全是一个主权国家；指责中国

政府在西藏实行“种族灭绝”。正是在这份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所谓西藏人权问题。

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是一个什么组织？

朱晓明：这个组织实际上是由美国情报机构在1949年创立的自由法学家审查委员会，也叫做苏联地区爱好自由律师调查委员会和自由法学家同盟组成的。正如美国法律协会杂志所说，建立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的“主要目的是搜集证据，向全世界提供文件证明，揭露铁幕后面共产主义的许多不公正的现象”。美国政府实际上把它看成是一个在冷战中反对共产主义的有用伙伴。

1959年9月，第十四届联大在纽约召开。美国国务卿赫脱在大会发言中，诬蔑“中国共产党残酷压制西藏人的基本人权，推行殖民主义政策”，称我平叛的目的在于“消灭西藏种族”。美国在幕后操纵两个所谓“中立国家”向联大提交了“西藏问题”议案。对此，美合众国际社评论道：“美国官员认为，如果美国采取行动，把西藏问题交联合国，那么就会使中立主义国家的人民认为这件事仅仅是一种冷战宣传而不予重视。”美、英等国为了迷惑人心，争取支持，对提案作了某些修改，未敢提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而是在“尊重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原则”的幌子下对中国进行诽谤和诋毁。10月21日，联大以45票赞成，9票反对，26票弃权，通过了这一反华决议。这就是西藏人权问题出笼的背景和过程。

美国人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朱晓明：曾经在美国跟一些美国学者、官员谈过这个问题。我对他们说，林肯废除了南方的农奴制，解放了黑奴，受到了美国人民的推崇，认